

北伐前後的西北軍

王禹廷

馮玉祥與西北軍之十九

綏寧廣漠艱難長征

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後，因為要收撫已經投靠閻錫山，駐紮在歸綏、包頭一帶的舊部，又要整編退到綏西地區零落散亂的部隊，所以他在五原停留了一個多月，並且去了一趟包頭。一直等到韓復榘、石友三、韓德元、韓占元、陳希聖等五個師，均已全部歸隊，陸續經過包頭，向西開拔。在五原地區的收容整編工作，也已告一段落。他才於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離開五原，經過臨河、磴口、平羅等地，均曾稍作逗留，撫慰正在行軍途中的隊伍，十二月一日到達寧夏的首府銀川。途中得知西安之圍已解，就在寧夏暫停下來。

由綏遠到寧夏，經過西套蒙古的阿拉善、額魯特、額濟納、土爾扈特等蒙旗之地，荒漠近兩千華里，人煙極為稀少。這條公路是馮玉祥於民國十四年間，出任西北邊防督辦時，派遣兵工修築的。名為公路，實際上不過是運用大批人力，以原始的方法，就已通行多年的荒山野徑，加以拓寬整平，可供汽車及牛、馬車勉強通行而已。筆者於三十八年春夏間，由北平經察綏赴蘭州，曾經走過這一條路，當時是坐的汽

車。從包頭、五原到陝壩、臨河的這一段，沃野千里，廣漠無垠，人煙雖然無多，尚不顯得過於荒涼，牛、羊、駱駝、馬匹等，到處成羣，大野風光，飽覽無遺，禁不住心胸為之鼓盪開擴。臨河以南，可就荒涼透頂了，我們車行近兩天，就沒有看到那裏有什麼煙火。只是每隔六十華里，便有一座土牆圍成，上覆茅草的小房子，供人休息。據說那些小房子，就是馮軍當年建築的，六十華里為一天的行程，在那裡準備好乾糧、飲水及騾、馬吃的草、料，以供部隊打尖（休息）及宿營時取用。想不到若干年來，一直成為行旅避風休憩的場所。我們每走若干里，就要停車稍事休息，如果不進入房內，即須站在車子的南側，以「避風頭」。因為塞上風勁，雖然紅日高懸，假如你當風而立，還是吃不消的。我們只有幾十個人，就有這種無法忍受的感覺。回想當年馮部大軍十餘萬，一批又一批的接連着，迢迢千餘里的廣漠長征，該是如何的艱辛？這種在二十世紀初葉所顯示的，尚且如此，如果把歷史拉回去，上溯到幾百年一兩千年以前，我們的老祖宗，為了保障我們民族的生存安全，開拓我們民族的生存空間，那種鐵騎遠征，橫絕朔漠，一往無前，開疆拓土的雄風壯行，就不禁熱血沸騰，低徊無

已。昔年的自然和人文環境，當然比現在差得很多，祖先們遭遇的艱難困苦，當然也比現在大得很多。可是他們憑恃着一股無可比擬的英銳雄勁之氣，勇猛搏鬥，排除萬難，征服了環境，戰勝了敵人，給我們締造了那樣雄偉美好的錦繡河山。想想秦皇、漢武、唐宗、明祖和蒙恬、李廣、衛青、霍去病、李靖、徐達等等不世出的英主名將，以及無可計數的無名英雄。他們決策廟堂，縱橫疆場，血染大地，骨暴原野，所爭來的神州大陸，却被我們不爭氣的這一代，斷送給俄帝共匪。現代的中華兒女，緬懷往烈，言念責任，於崇敬、感慨、惶悚、慚愧的複雜情緒交縈之餘，寧不知恥奮發，光復故物，告慰列祖列宗的在天之靈，解除億萬同胞的苦難之實。

由臨河到磴口，不但渺無人煙，而且缺乏水草。人的飲食，騾、馬的草料，都無法就地取給，要從老遠的地方，採辦運存，以備部隊經過時使用。幸好馮軍過境的時間，是在秋天，如在炎夏，恐怕會真如石友三所說：「不餓死也得渴死」。馮軍的兵站，（以前叫糧台，現在叫後方勤務。）設在這漫漫長途的兩頭——臨河和磴口，臨河屬綏遠，磴口屬寧夏，由蕭振瀛和聞承烈兩人，分別負責。這兩人就因此番後勤支援辦得

很好，以後都會飛騰達過一陣子。臨河那時還未設縣，是個設治局，蕭振瀛任局長。他本無軍職，却在那裡準備糧草，支應部隊，辦理得井井有條，供應得源源無缺。得到了宋哲元的深切賞識，以後便一直隨宋做事，成爲宋的心腹智囊。民國二十六年「七七」事變以前，宋哲元主持華北軍政，蕭振瀛出任天津市長，周旋於南京、北平及有關各方之間，簡直紅透了半邊天，成爲一個炙手可熱的大人物。據說宋哲元能够「指日高升」，（在日本軍閥強力壓迫的微妙環境中，宋氏脫穎而出，坐鎮華北，權傾一時，人們便說他是「指日高升」。）大半出於蕭振瀛策劃奔走之功。後來宋哲元部下的文武大員，曾有政策意見的派系之爭。蕭係東北人，不是西北軍的嫡系，民國十四年宋任熱河都統時，才行結識。因爲根基不固，而且氣勢薰天，到處招忌，便被撻下台來，出國遊歷。再後來宋哲元沒落，蕭便從此失勢。抗戰時期，他在重慶做生意，開銀行，幹得非常熱鬧。他爲人四海，長袖善舞，具有北方人豪強慷慨之氣。能結交達官顯宦，也能拉攏市井人物，所以「座上客常滿」。他口沒遮攔，亂開黃腔，無所避忌，人們便以「賺錢、請客、罵人（罵大人物）、打牌」八個字，來形容他的日常生活。抗戰勝利不久，他得中風症死於重慶。聞承烈在磴口，事情辦得也很周妥。以後他出任第二集團軍兵站總監，俞飛鵬是第一集團軍兵站總監。這南北兩總監，地位相等而境遇不同，一個憑藉優厚，青雲直上，一個處境坎坷，潦倒以終。十九年馮玉祥失敗，聞承烈投奔山東韓復榘，弄了

個不大不小的官職，維持生活。抗戰之初，馮玉祥出任第六戰區（津浦鐵路北段沿線地區）司令長官，聞承烈再次榮任兵站總監。不久，第六戰區撤銷，馮氏離職，他降任韓復榘的兵站分監。韓倒台後，這個機構也裁撤了，他又窮無所歸。其時俞飛鵬貴爲軍事委員會後方勤務部部長，主持全國後勤業務。看在馮玉祥及和聞是老朋友的分上，給了聞一個後勤部第四辦事處的名義，帶領官兵十二人，駐在陝南白河，擔任大後方對第五戰區的接運補給。沒有多久，這個辦事處又給裁撤，聞承烈沒有下文，以後就不知如何歸宿了。一人成佛，鷄犬皆仙，樹倒自然猴猴散，古今一例，毋足怪也。

馮玉祥在寧夏住了大半個月，十二月二十日，又由寧夏出發赴平涼。其時甘肅和寧夏尙未分治，寧夏是隴北重鎮，平涼是隴東重鎮，前者是綏（遠）、陝（北）、甘三省的咽喉，後者是甘、寧、陝（關中）三省的要衝，皆具有軍略上的重要價值。國民軍由綏西開，東轉入陝，都要經過這兩個地方，休息整補。馮玉祥就在這兩處分別停留，慰問民衆，處理軍務。然後繼續東行，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日，到達西安。于右任率領軍政要員及各界代表多人，在距離西安四十華里之咸陽古渡的渭河邊上，隆重歡迎。

善後安排煞費苦心

馮玉祥進入西安，設總部於「紅城」。這一「紅城」位於西安城內的東北角，它是明朝初年分封皇子的所謂「藩邸」，俗稱「皇城」。滿清一朝，劃爲旗人居住之區，又稱「滿城」。清末庚

子八國聯軍之役，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逃難到陝，曾經駐蹕於此。辛亥革命時付之一炬，成爲一片廢墟。民國十年冬，馮玉祥出任陝西督軍，就在那廢墟上重新建築了幾十間平房，作爲督軍公署辦公處所，一般人把它叫做「新城」。此番經過八個月圍城之戰，新城內荒草沒胫，房子也多殘破。解圍後于右任由三原移駐西安，以總司令兼理省政。他把新城命名爲「紅城」，以紀念守城將士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，并企望他們再接再勵的創造國民革命的功業。當時正在聯俄容共時期，一切尙「紅」。于氏又係新從蘇俄歸來，展現了一些嶄新的作風。有些人不明他命名的真義，誤以「紅城」含有「紅色城市」的意思，頗多疑慮。十六年清黨後，于右任離陝，石敬亭代理陝西省主席，遵奉馮玉祥的指示，把「紅城」正式改名爲「新城」。十九年中原大戰結束，楊虎城勝利回師，主持西北軍事及陝西省政，一度想把這新城改名爲「虎城」，（楊原名彪，字虎臣，以字行。出師北伐時，他覺得「臣」字含有封建殘餘的意味，乃更名虎城。）因爲地方大老不同意，而未果行。這座高踞中國六大古都之首的西安城中的「小圈圈」——新城。其與華演變，竟有如許的滄桑與曲折，順便一提，亦趣談也。馮玉祥這次是第三度到西安，他就在这座自己重建的「小圈圈」中，發號施令，整軍經武，從事於一個新時代使命的開拓。

這是他一生事業中物質上最爲艱苦的時代，也是他精神上非常昂揚的時代，更是他聲華上趨於顯赫的時代。

此時南北大局，正在微妙複雜中醞釀着重大變化，留待以後再說。這裏先看看馮玉祥面臨的內部問題：

首先是他的嫡系部隊的整補。馮軍雖然訓練有素，但經過這樣長期長程的戰亂流徙之後，元氣大傷。且因千里赴援，損耗增多。必須加緊整補，以維戰力。可是陝、甘兩省地瘠民貧，財物均缺，所有兵員、糧餉、械彈、被服等等支應，均無着落，這是他大傷腦筋的事。好在他的部隊素質單純，生活刻苦，當前正在邁向勝利發展的途中，一時的困窮，不難忍受克服，問題尚不算十分嚴重。

其次是雜軍的撫輯。由綏遠隨他而來的國民軍第二、三、五軍各部隊，因為馮把他們一律編入第二集團軍序列之中，有些人會有不同的意見。原駐陝、甘兩省的地方性武力，各據一方，自成局面。其中寧夏的馬鴻逵，在綏遠時業已納入馮軍系統，寧夏鎮守使馬鴻賓，也已率部隨馮軍東開入陝，算是沒有什麼問題。此外陝北井岳秀，青海馬麒，河西馬廷勳等，外貌上表示服從，實際上各自為政。留駐關中地區的國民二、三軍部隊，如堅守西安的李虎臣、楊虎城、衛定一，駐在三原的田玉潔等四個師，以及隨風轉舵，東投西靠，當時尚盤踞省東大荔的麻振武，省西鳳翔的黨廷佑（黨拐子）等部，訓練紀律雖欠佳，戰鬥力則頗強。這些陝籍部隊，皆源出靖國軍，曾受過于右任的統屬。此次于氏回陝，馮玉祥任他為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，（鄧寶珊為副司令，）令其收撫舊屬，統一指揮。但因為該部素質複雜

，不受羈勒，于右任的職權和命令，很難順利的貫徹下去。他深感難有作為，曾一度避往耀縣樂王山，擬作退隱之計。迨馮玉祥由甘來陝，連電敦促，于又重回西安，協助馮氏從事整頓善後的工作。鑒於以後麻振武、黨廷佑據城頑抗，李虎臣、田玉潔勾結叛變，以及岳維峻、徐永昌、方振武等人先後率部脫輻而去。則知此時正在大敵當前，內部虛弱之際，對於這些龐雜的軍隊，如不能妥善安排，謀取穩定，不僅處處潛伏着隱患，而且會隨時變生肘腋。沒有穩固的後方，怎麼能支持未來的大戰？這是他苦思慮的另一樁大事。總算他費盡苦心，才得暫時擺平。

軍費籌措羅掘俱窮

第三最嚴重的是全軍經費的籌措。馮軍自撤出北京，敗退察、綏以後，軍實供應，全賴就地取給。陝甘兩省本係貧瘠，財賦原很短絀。加以連年用兵，征誅過甚，民力早已凋敝，驟然增加了二、三十萬人的軍費負擔，如何能籌得出來。馮玉祥到達五原之初，即已覺察到這一問題的嚴重。便調甘肅省長薛篤弼為總部財政委員會委員長，負責張羅。薛篤弼由蘭州帶來銀洋十萬元，棉軍服幾千套，只能供應總司令部部的緊急使用。王瑚把他經手積存準備展築包（頭）寧（夏）鐵路的基本數萬元，全數拿出，也只能濟一時之急。塞上嚴寒，官兵缺乏棉衣，凍上加餓，幾難維生。他們大量征集民間的羊隻，吃羊肉，穿羊皮，解決衣食的迫切需要。（綏、寧、甘肅，盛產牛、羊。羊皮有羔羊皮、老羊皮兩種。青海的紫羔皮是黑色捲毛，寧夏的蘿蔔絲是白色捲毛，這

兩種羔羊皮是羊皮中的上品，又輕又暖，價格昂貴，富人用綢緞料子，縫成皮襖、皮袍，冬天穿着。老羊皮皮厚毛長，價錢低廉，穿起來很重，但風吹不透，禦寒力強。窮人不必買布，把老羊皮翻過來，做成衣服穿上，即成爲他們冬天的禦寒恩物。馮軍官兵就穿這種老羊皮縫成的大衣，渡過了漫漫長冬。）弄不到老羊皮的人，就只有憑藉體力忍受嚴寒的煎熬。十五、六年多春間，在綏、甘到陝西的長征途中，凍死者時有所見，未凍死而肢體殘破，面目潰爛，痛楚難耐者，比比皆是，真正是慘不忍睹。且因醫療設備不足，藥物缺乏，凍傷凍病及其他傷患官兵，得不到適當治療，成爲終身殘廢或死亡者，所在多有。傷者固極痛苦，死者則無棺爲殮，多以土布裹身，埋於土中，當時稱之爲「革命棺」。如此景象，真有不知人間何世之感！

嚴冬過去，炎夏又來，他們搜購土布，用土法染爲灰色，做成單衣，聊以蔽體，實在够寒儉的。就這樣，還因人多衣少，不够分配。那不能換季的，簡直爛襪的有如叫化子（乞丐），吃的也是一樣，大家都吃「革命飯」，總司令也不例外。麵食爲主，用幾樣蔬菜做成大鍋菜，各人自行取用，有時加點肉類，就算是打牙祭了。某次，一位南方的朋友到西安看馮，暢談之頃，馮氏叫人端點心，客人大感意外。等到端來一看，原來是切成一塊一塊的青蘿蔔。馮氏取食不迭，還一再的敬客，說是營養不錯，可以開胃順氣。即此一點，可概其餘。就這樣最低限度的衣食之需，還是非錢莫辦。而民力已竭，徵求甚難。任你

薛篤弼是多麼高明的理財能手，也無法點石成金。事急亂動手，什麼點子都得出。姑且舉一個例子：甘肅有一位翰林劉爾忻，民國成立後不肯做官，一心一意的興學育才。蘭州名勝五泉山上的許多建築。也是他一手經營的。他經過十多年的籌維，手中積存了銀洋六、七十萬元，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可觀的大數目。劉郁芬因為軍需孔急，把腦筋動到這筆錢上，軟來不行，就想動粗。事為馮玉祥所知，立即嚴電制止，說是劉負地方清望，錢是教育經費，千萬動不得。劉郁芬才沒敢下手。執此一端，就可見他們羅掘俱窮到不擇手段的地步了。馮玉祥惟薛是問。薛篤弼日坐愁城。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，陝西固然籌不出許多，甘肅的接濟更是寥寥無幾。軍隊上吃的還就地寬取，用的則無法解決。武漢和南京的兩個國民政府。雖會答應補助，但却你推我拖，而且藉口交通阻絕，匯兌不通，口惠而實不至。西安市上，不但看不到現大洋，連銅元也不多见，其他城邑大多類此。當時，在無辦法中想辦法，先以由張家口帶來的西北銀行紙幣，作為現洋通用。不久，紙幣用光，乃借陝西省立之富秦錢局所存的紙票，加蓋總司令部印信，代替使用，是為「加字票」。以後「加字票」也用完，乃又印行一種不兌現的「軍用流通券」臨時通用。有一天，庫存只有現大洋五百元，流通券也將告罄，而最低限度的軍費供應，實在不容中斷。於是薛篤弼商承馮氏同意，儘此五百銀元，派人到山西（陝甘不產質料較好的紙）買來紙張，大量印刷流通券，分發待命東征的各部隊。這五百元現大洋，馮

玉祥後來稱之為最後的「北伐本錢」。在此大半年中，馮軍真是困苦萬狀。官兵不發薪餉，士兵每人每月只准借伙食費五元，官長不分階級，每人每月只借十元。（西北銀行紙幣，富秦票或流通券各半數，折成後實得七成五。）後來大軍出發，更減為每月士兵三元，官長六元，其窮苦可想而知。若非馮氏治軍嚴明，團結堅固，恐怕不是紀律廢弛，就是部隊解體了。後來孫良誠指揮大軍，打到鄭州，開封一帶，跟由武漢北伐的友軍會師，曾由前線打電報給馮訴苦，他說：「武漢前來的部隊，都用現大洋，各地人民無不歡迎。惟有我們只靠軍用券和人民交易，處處遭人白眼，而且使人民對我們部隊發生惡劣印象。同是為革命而流血的部隊，為什麼待遇如此不同？」孫良誠說的當然是實情，同樣都是革命軍，所受的待遇竟然差別如此之大，不但影響官兵情緒和軍民感情，進而也會有礙任務的遂行。作為一個戰地的高級指揮官，他面對這一嚴重的現實，不能不特加重視而向上反應。可是馮玉祥看在眼裡，痛在心裡。他明知南方革命軍來自富庶之區，自己則處在貧瘠之地。雙方的經濟環境大不相同，官兵的待遇自然就相差懸殊了。限於事實，徒患奈何！他只好三令五申的勉慰部屬，要他們咬緊牙關，奮勇作戰，以勝利求取問題的解決。並要他們儘可能跟友軍隔離駐紮，免得相形之下，過份難堪，產生不良的後果。好在武漢北來的部隊，不久仍行南去，馮軍在河南的局面也告開展，才把問題給沖淡下來。而為革命起過大作用的那種流通券，最初由一元跌落到七折至三折，且

為人民所拒絕使用。武漢和南京的兩個國民政府，始終沒有作適當接濟。這流通券只好勉強流通下去，直到後來由在馮軍範圍內的隴海和京漢兩鐵路局，予以收用兌換，才漸漸升高價值。它於最後完成其時代任務以後，才慢慢的從市場中消失。豫陝各省人民因此而遭受的虧累損失，那就無法計數了。

「兵困」如此，「民困」又如何呢？陝甘是馮軍的大後方，河南是馮軍的最前線，凡所需索，皆由這幾個省區來負擔。

因為戰爭發展的需要，軍隊大量擴張，大量損耗，損耗之後又要不斷的補充。這種擴張補充所要的人員和物資，絕大部份是出自陝甘兩省。於是征兵、徵糧、派款，就成為西北人民漫無止境的沉重負擔。因為需用孔急，既無一定的法令可據，又沒有前軌可循，祇是按照實際的需要，一批一批的硬性攤派，催索勒逼，無所不用其極。加上被打垮而未消滅的地方殘餘武力，所遺留下來的散兵游勇，以及由此演變襲脅而成的流氓土匪，到處流竄滋擾，社會為之騷然。老百姓所遭受的重重痛苦，真是筆難罄述，其慘狀可用「竭澤而漁，民不堪命。」兩句話可以概括，用不着再細說了。

不過進一步的加以分析，由於西北軍的堅強奮鬥，西北人民的艱苦支持，乃使北伐統一的大業，得以迅速完成。其對國家的偉大貢獻，無論就歷史或現實的意義來看，都值得大書而特書。那麼，一時一地的苦難犧牲，在獲得勝利光榮的重大代價之後，就無須再說什麼了。